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弗莱研究：
中国与西方



张其成讲读 · 中国研究丛书

张其成讲读：
中国研究：中国
与西方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G02
W292

弗莱研究： 中国与西方

王 宁 徐燕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王宁等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7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ISBN 7-5004-1919-8

I. 弗… I. 王… II. 弗莱-研究 N. B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027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0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3.50 元

责任编辑 万小器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李 建

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罗伯特·丹纳姆 A.C. 汉密尔顿 林达·哈琴
伊瓦·库希纳 威廉·H. 纽 李赋宁

王佐良

主编 王 宁 吴持哲
编委 万小器 乔纳森·哈特 郭继德 江 溶
秦明利 王逢振 王 宁 王仁强
吴持哲 叶舒宪

总 序

在 20 世纪群星璀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位加拿大人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就是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正是这位伟大的加拿大学者,以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卓越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他的理论思想不断地被东西方学者和理论批评家引用和讨论,从而为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学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正是出于对弗莱的遗产发扬广大、把加拿大文化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之目的,我们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王仁强(Richard King)参赞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编辑了这套“弗莱研究丛书”,旨在把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同时也让弗莱的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产生相互启迪的作用。

弗莱作为 20 世纪屈指可数的大师级思想家和理论家,其贡献和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仅作一简略概括:(1)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或文化革新者,弗莱毕生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使其在国际文化理论界独树一帜;(2)作为加拿大在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发言人,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曾一度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其后又逐步被再度“边缘化”的历程,但到了临近世纪末的今天,人们又发现了他的理论的潜在价值;(3)作为一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五六十年的西方文论界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4)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元批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他的理论对结束“新批评”在英语文学和文论界实际上的

一统天下和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的兴起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弗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术理论流派，但他同时却又能与任何一个当代批评流派进行对话，引发他们争论，给他们以启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行共同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在此我们谨向加拿大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慷慨资助使这套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同时我们也感谢出版本丛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本丛书也不可能顺利出版。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读者认识弗莱及其理论有所帮助，同时也对整个弗莱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

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5年9月

编者前言

王 宁

本书是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之一种，实际上也就是“诺思洛普·弗莱与中国”国际研讨会（1994年7月12—17日，北京）发言的精选论文集，其中罗丝安·蓉特、林达·哈琴、丁尔苏和程爱民这四位学者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但会后仍然寄来论文，这充分体现了这几位学者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马里欧·沃代斯、乔纳森·哈特和张辉三位加、中学者虽未出席会议，但在听说编者征稿时照样欣然为文集撰稿，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浓厚兴趣，我在此首先代表本丛书编委会向他们致谢。

本书按照内容和相关的论题，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弗莱与文化研究”的论文大体上依循文化研究的思路而写作。汉密尔顿首先追溯了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发展历程，不无正确地指出，虽然弗莱一贯被人们认为是一位文学理论家或神话—原型批评家，但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弗莱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一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他弘扬了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他的文化意识和将文学置于文化之中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但与其他文化批评家所不同的是，弗莱远离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大潮；他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批评流派，因此将弗莱简单地定为某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至少是失之偏颇的。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弗莱的立场

是一贯的，并非仅出于对形式主义的不满。他与一般的文化批评家的区别主要在于他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并且曾是加拿大联合教派的一位首领人物。由于弗莱的独特的文化批评方法，即将文学本身当成大文化语境之中的一个整体，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弗莱对当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沃代思作为弗莱在北美现代语言学会的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弗莱当年在国际学术界的角色，他的论文则从探讨多元文化主义这个在当今北美学术理论界广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出发，阐述了弗莱与当今一系列批评论题的关系及其意义，其中涉及到不少文化研究者和当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立论基点是他一贯坚持的阐释学立场。应该说这两篇重头文章的基调为全书的后几部分定了基调。阿丹姆森的论文题为“弗莱与意识形态”，探讨了一个不大为人们注意的领域：弗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的论者大多认为，弗莱作为新批评向结构主义批评过渡时期的一个中介性人物，其整体性批评模式仍有着鲜明的美学主义倾向，而与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化批评无甚直接的关系。而阿丹姆森则认为，弗莱的早期著述确实是远离意识形态批评的，但在他晚期的著述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的成分却占有很大的比重，“当前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框架下进行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弗莱学术生涯的开端。”接着他从修辞的角度，辨析了弗莱与美国的解构主义理论家的一些内在相通之处，从而打破了把弗莱固定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审视的习惯做法。他通过层层推论，指出了弗莱与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和读者反应理论家菲什的区别以及与巴赫金的对话性观点的相通之处。也许正是这种内在的相通之处使得这两位跨时代的思想家仍不断地被人们提及和研究。应该说上述几篇文章的从总体上来说对弗莱建构的文化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抱着一种钦佩和赞叹的态度，这在加拿大学者尊敬和崇拜本国的大师级理论家的心理并不为过分。旅美中国学者刘康的论文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论述出发，探讨

了弗莱的“文学原型”理论中的普遍主义、美学和乌托邦三个方面及其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他首先指出了弗莱理论的反历史化和普遍主义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既相悖又不无相通之处。在他看来，弗莱的本体论基础是神学，这倒构成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因此说弗莱是一位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中介性人物，其原因恰在于他的理论核心“原型”超越历史、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自主、自律、独立的内在价值。他在联系到弗莱的理论可能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反思和文学批评发生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弗莱的贡献在于对文学创造的形式与结构作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阐释、分析，推出了一个‘原型论’的整体体系”，因而就这一点来说，“弗莱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上的创见”，但尽管如此，刘康仍然认为，对于弗莱的理论及其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作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则有助于了解文化思潮与现代性经验的相互关联。

上述几篇论文都从论者所处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身份对弗莱的文化理论作了讨论，同在这一部分，库希纳的立论基点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1）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2）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3）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最后，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应该说，他的研究超越了学者们以往的视野，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论题不无启发作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跨学科性以及其对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启迪：拜尔佛作为弗莱以前的学生，以自己所目睹的一件逸事阐述了弗莱与解构主义者在修辞这一点上的相通之处，发表了前人未曾发表过的新见解，他指出，“弗莱的话语的力量在于其悖论，这是他的学说中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也是未来的研究者将不断求教于他的东西”；程爱民则通过对两位曾对弗莱的批评理论产生

过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师——荣格和弗雷泽——的比较以及其在弗莱理论中所占的比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弗莱的原型批评主要是建立在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其‘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之上的，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是其神话理论）只是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切入点和外壳”；弗莱的原型批评虽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但实际上并不能被当作一种精神分析批评，因为它与后者仍有着较大的差异。他的这一观点在后面显然受到了质疑回应。

第二部分“弗莱与现当代理论批评”着重论述了弗莱在现当代西方文论中曾起过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在仍然具有的意义，在这方面，三位中、加学者的论文都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对弗莱的理论作了全新的阐释。王宁的文章在引证了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詹姆逊的观点后通过细读弗莱的著作，得出这样的结论：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弗莱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居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现代主义文评的最后一位巨人，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弗莱及其批评理论对当今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意义体现在：（1）他大胆地将民间传说和神话等亚文学体裁包容进文学的话语，从而打破了高级文学与低级文学之间的界限；（2）他使文学研究参照其他学科及表现领域，如宗教学、人类学、神话学等，从而打破了文学批评的自足性和理论的整体性这个属于“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之束缚；（3）他对加拿大文学之“殖民性”的提及在当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高涨中得到了回应。此外他的不少随意性、偶发性和断片式的理论叙述也充满了后现代写作的风格，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弗莱的理论仍能引人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林达·哈琴虽然也持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但她更为审慎地将对弗莱的论述限于他为《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两篇结论，从而论证了弗莱之于加拿大文学本身的重要性：弗莱从某种“边缘”的地带介入了国际性的批评理论争鸣，并且间接地触及到了

一些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论争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弗莱过去的学生和北美主要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哈琴采取的是后现代的消解二元对立的方法，探讨了弗莱理论中的既/又共存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之特征。照她看来，弗莱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使得后一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者认识了加拿大文学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机构化”了。通过这种“后现代式”的切入，哈琴阐发了弗莱的两篇“结论”中的后现代范式的连续和差别，弗莱的“悖论式”叙述正是他的后现代特征所在。哈琴的结论是，弗莱总体上仍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但却“不能简单地论证弗莱是一个闭门造车的现代主义者”，既然“在他的著述中也许存在着后现代因素，尤其是那些因素的大部分就在他关于加拿大问题的著述中”，因而我们今天讨论弗莱及其理论仍有着现实意义。乔纳森·哈特从弗莱著述中的自相矛盾性切入，读出了其中的不少后现代因素。他首先指出，《批评的解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含混，在德里达和德曼之前的解构主义反讽之前就已存在，而弗莱的理论则同时存在着双重因素：其现代主义特征体现在偏爱整体化，而解构主义者则反对这种整体化，主张多元化。反讽既是选择性的又是对立性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反讽这一中介而实现的。哈特认为，弗莱也赞同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强调作为神话表达的叙述的能量之论点，同时也同意哈伯马斯强调系统化和解放的观点。这是具有后现代性的弗莱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后现代主义本身蕴含着的矛盾冲突。这同时也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反讽的讽刺。因此在他看来，“后现代的”弗莱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束缚，一直在努力去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他的结论是，弗莱在许多方面既是现代主义者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应该指出，这三篇论文的新观点在整个弗莱研究中都是一大突破，对于我们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弗莱及其批评理论的价值不无启发意义，同时也说明，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恰

恰就因为他的理论蕴含了可供多重视角来阐释的代码，因此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它本身也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地被人们读解、阐释并且重构。这也许就是弗莱对于当今的批评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一部分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对弗莱最重要的著作《批评的解剖》作了阐释：丁尔苏的切入点是符号学，他认为该书第三部分“神话理论”对以后的文学批评影响最为深远，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点，即弗莱的象征理论，而这正是他的原型理论之基础。丁的结论是，弗莱的理论虽然是文学理论，但他的有关论述对建立一个更为完备的符号理论也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不少符号学研究者在自己的专著中也时常引证弗莱及其理论。张辉的论述方法是比较式的，也即通过对荣格和弗莱的两种原型理论的比较发现弗莱的建树。与程爱民的观点相左的是，他认为，弗莱对原型与形式的内涵的揭示并非从心理学出发，而是从文艺批评的立场出发的。他通过仔细的阅读，辨析出了这两位理论家在原型问题上的差异，指出了弗莱的创新和建树：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反动，弗莱提出的原型概念使文学形式概念得到了丰富和扩展，使文学批评对单个作品的关心扩展到对整个文学的关心。王逢振选取的切入点也是《批评的解剖》，他认为，弗莱虽不是一位反形式主义者，而且与新批评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高超的一点恰在于他及时地摆脱了新批评的僵化模式，这本书的特点并非是对所提及的几百部作品作详细的分析，而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群体”或“谱系”。弗莱的“文学原型”不同于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它是整个创作经验的基本因素，而不是个人头脑或种族意识里经常出现的那种模式。弗莱要求的是一种比新批评更强烈的形式主义。但是尽管如此，弗莱的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不断依靠相似和类比阐述他的观点，虽然这些类比常常令人感到惊奇，但它们在逻辑上的可靠性却缺乏足够的证据。尽管如此，弗莱对 60 年代以后批评理论的确立仍

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一部分还收入了蓉特的一篇充满诗情话意的散文，从而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弗莱的论文中的象征意义作了阐发。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第三部分“弗莱与中国”中的论文稍弱了一些，这一方面说明弗莱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仅仅处于介绍的阶段，此外，由于弗莱的著述中很少提到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因而从影响研究的视角很难有所突破。在这方面，罗伯特·丹纳姆的考证性论文以扎实的研究和充分的证据首次披露了这位加拿大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为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三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平行探讨了弗莱理论之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可能价值，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丹纳姆指出，从弗莱的几本笔记中可以看出，弗莱对东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远比我们从他已出版的著作中看到的丰富得多，深入得多。弗莱从东方文化和宗教中受到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这无疑将对我们从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视角来研究弗莱及其理论不无裨益。叶书宪作为中国较早开始评介弗莱的批评理论的研究者，把自己以往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切入点是一般人几乎完全忽视的：汉字与原型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探讨“弗莱与中国”这一主题似应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对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构想所应有的启示和帮助，而后者实际上长期被人们忽视了。因此在这方面，叶文为今后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弗莱研究指出了一个新方向：汉字对原型研究的重要价值。刘乃银的文章在简略回顾弗莱研究在中国的现状之后，集中比较了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中的文学分类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以及欧洲中世纪天文学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弗莱在安排文学世界时所用的封闭式形式与其说接近中世纪欧洲天文模式，倒不如说更近似中国的阴阳理论赋予宇宙的形式，因为中国的阴阳理论显然既是循环的又是辩证的，在许多方面比中世纪欧洲天

文学要科学和优越得多。刘文同时也指出了弗莱理论体系的不足：弗莱的大胆和随心所欲导致他的理论中存在一些非科学因素，他的体系既有科学和辩证的因素同时又有反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因素，但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仍不无一定的价值。王亦蛮的文章认为，《批评的解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其象征系统的建构。弗莱的象征是意象性的，也即一种文字画像，它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字世界有着区别，因而意象比原型更丰富，原型则比意象更典型。庄子的“齐物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弗莱的理论不谋而合，这使我们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来比较弗莱的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之关系成为可能。通过比较，王文揭示出中国的代码与弗莱所编织的代码是如何演化成一个自足自指的符号体系的；这两套体系是思考主体借以规范并理解客观世界和文学世界的工具，因而它们都具有特殊的中介性。最后王文试图说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思考主体在观察自我与外部世界时确实共有一些认知途径，并能达到某种共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可能对弗莱的理论建构有所启迪，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弗莱的理论，最后这种双向阐发便构成了东西方的对话。可惜的是，这方面的论文在本书中太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弗莱研究在中国的现状。

通过上述简略的评述，我们大概不难看出本书的如下特色：若将弗莱及其文化和批评理论置于西方文化的语境下，学者们的研究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在理论上也有所创新；但既然本书以“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为题，那就必然要把弗莱及其理论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跨东西方文化和不同学科的广阔语境下来研究，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的研究可以说则刚刚开始。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和新思路就是跨文化研究，也即把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跨东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下来研究，这样我们就能发现一些新的有意义的课题，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从而使日益变得“机构化”甚至僵化的狭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摆脱出危机

的境地。当然从跨文化的高度来研究包括弗莱理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以及其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双向的和对话的，而非简单的影响与接受之）关系，我们还有更多的课题可做，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仅向学者们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希望所有对之有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把跨文化研究在中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